

从“目睹身历”到“考古验今”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综合探析

孙文洁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9月9日；录用日期：2026年9月29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14日

摘 要

《西域图志》，全称《钦定皇舆西域图志》，是清高宗初定西域后官修地方志之一，编纂者许敬宗、褚延璋等于乾隆四十七年，据何国宗带回的测绘资料与官方军政档案编纂而成。政治背景方面，清朝平定西域，完成了西北疆域大一统。学术价值方面，全书体例完备，分为天章、图考、列表、分志、杂录，分门别类地清楚记述了清代西域地区的政治制度、军事管理、人文风俗、地理风貌等诸多内容。本文从编纂背景、书本体例、编纂优长、缺陷不足、版本情况和对后世研究的价值六个方面，将《西域图志》进行系统分析与评价。《西域图志》在《天章》《官制》中阐发了西域历代共尊中国认同；《疆域》《山》《水》中抒发了历朝共聚中国西域版图；《屯政》《钱法》中宣扬了西域历朝共承中国之制。该书是清代西北史地学开山典籍，是研究清代西域必不可少的史料工具书，保存大量一手原始文献，具备极高的文献价值与史学价值。文章进一步讨论版本层级及其作为西域文学史料的使用边界，主张对其中诗文、地名、风俗、音乐等材料应分别判断其证据性质，避免把官修定本直接等同于未经加工的一手记录。

关键词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官修方志，编纂特色，史料价值，版本流变

From “Personal Witness and Experience” to “Archaeological Verification of the Presen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Imperial Approved Royal Atlas and Gazetteer of the Western Regions*

Wenjie S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September 9,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29,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4, 2026

Abstract

The Imperial Approved Royal Atlas and Gazetteer of the Western Regions is one of the officially compiled local gazetteers completed after the Qianlong Emperor of the Qing Dynasty unified the Western Regions. Compiled in the 47th year of the Qianlong reign by Xu Jingzong, Chu Yanzhang and other scholars, the book was composed based on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data collected by He Guozong and official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rchives. In terms of political background, the Qing Dynasty's pacification of the Western Regions realized the great unification of the northwest frontier. In terms of academic value, the book features a well-structured compilation system, consisting of six parts: Imperial Edicts and Writings, Atlas Research, Statistical Tables, Sub-gazetteers, and Miscellaneous Records. It systematically and categorically records the political systems,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human customs, geographical features and other key in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conducts a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book from six dimensions: compilation background, textual structure, compilation advantages, inherent deficiencies, version evolution, and research value for future studies. The chapters of Imperial Edicts and Writings and Official Systems elaborate the consistent recogni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over the Western Regions throughout successive dynasties; the chapters of Territory, Mountains and Rivers demonstrate that the Western Regions have been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s territory across dynasties; the chapters of Garrison Administration and Currency System illustrate the inheritance of China's institutional system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through successive dynasties. As a pioneering classic of northwest historical geography studies in the Qing Dynasty, this book is an essential documentary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Qing Dynasty's Western Regions history. It preserves a large number of first-hand original documents and boasts extremely high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value. 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hierarchical differences of its various versions and the application boundaries of the book as a literary historical material of the Western Regions. It proposes that the evidentiary attributes of its records on poems and prose, place names, folk customs, music and other materials should be judged separately, avoiding equating the officially finalized version with unprocessed first-hand records.

Keywords

The Imperial Approved Royal Atlas and Gazetteer of the Western Regions, Officially Compiled Local Gazetteer, Compilation Characteristics, Historical Material Value, Version Evolu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是清代新疆早期最重要的官修史地文献之一。今所通行的乾隆四十七年定本为正文四十八卷、卷首四卷，内容涉及图考、列表、晷度、疆域、山水、官制、兵防、屯政、贡赋、钱法、学校、封爵、风俗、音乐、服物、土产、藩属、杂录等门类。如果只将其概括为“史料原始、可信度极高”的综合工具书，这种评价显然尚未进入史料学真正需要处理的问题——一条材料为何会进入《西域图志》，它在进入定本之前经历了怎样的采集、转录、考订和分类，今天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据以证明历史事实。¹

¹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四十七年武英殿刻本著录为“四十八卷，首四卷”；今本总目所列门类亦可参见（清）傅恒等编纂，钟兴麒、王豪、韩慧校注：《西域图志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围绕《西域图志》的研究并非空白。薛宗正较早从全书内容与学术价值作综合评述；乔治忠、侯德仁系统考察乾隆朝官修《西域图志》的缘起、纂修阶段与学术史意义；陈世明从维汉、蒙汉合璧地名切入，揭示该书地名转写与多语接触的复杂性；姚三刚、高健又将《西域图志》放回清代回疆方志谱系中加以定位；吕长颖则以硕士论文专门研究其编纂与成书。这些成果已经解决了“谁来修、何时修、为何修”以及舆图、地名等若干重要问题。本文将问题收束为三个层面：其一，乾隆二十一年至四十七年的多阶段编纂如何造成不同时间层次的材料叠合；其二，实测材料、官署档案、历代史籍与编纂按语之间应如何划分证据等级；其三，作为文学史料使用时，哪些材料可以直接说明作品与知识环境，哪些只能说明官修知识体系对西域的表述[1]-[6]。

2. 编纂背景

（一）测绘与“考古验今”同步启动

《西域图志》的起点不是书斋编纂，也不像《新疆图志》是因新疆及内地动乱不堪，清朝认为“非资其政治原委，无由考镜，于是使令各省设通志局。”，而是战争结束前后对新疆地理知识的重新搜集。乾隆二十一年二月谕旨提出，应将山川地名“按其疆域方隅，考古验今”，并特别强调刘统勋、何国宗所获应来自实际经历，而非仅凭旧籍。同年四月，何国宗又奉命测量晷度、绘制地图，刘统勋则与之同行考验山川地名。因此，测绘、地名调查和历史地理考辨从一开始就是并行的，一方面需要获得新的空间数据，另一方面又试图用这些新知重新解释《汉书》等旧籍中的西域地名[7]²³。

《西域图志》大部分资料来自于实地勘察，从启动时就被要求“考古验今”，也就是说，实地调查并不排斥旧史，反而是为了重新校验旧史。乾隆御制序后来概括其方法时，一面强调诸臣“目睹身历”，一面又说“间亦涉及诸史，以存述古”。二者共同构成该书的知识基础[8]⁴。

（二）从调查材料到方略馆初稿

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刘统勋、何国宗“所办西域图志”奉旨交军机处方略馆办理；次年十一月，傅恒等奏报初稿告成。这一步意味着材料性质发生第一次明显转换。前线测量、问访、路线记录和既有史籍，并不是原样装订成册，而是进入方略馆的中央编纂体系，由总裁、纂修、收掌、誊录等人员重新编排。乔治忠、侯德仁据纂修材料指出，乾隆二十七年初稿为四十六卷，尚不是今天看到的最终定本[1]⁵。

方略馆环节的意义在于“材料”转化为“门类”。同一条地名信息，可能先存在于测绘人员的路线记录或地图中，进入志书后则被安排到图考、晷度、疆域或山水之下；一项新设官制，也可能在地方奏报中首先出现，最后被归入官制或兵防。对史料使用者而言，现存定本首先是被分类过的知识，而不是档案原件的简单复制。

（三）增纂、统校与定本

初稿完成后，新疆的建置、军政和交通并未停止变化。乾隆四十二年，朝廷重新派福康安、刘墉以及于敏中、英廉、钱汝诚等主持《西域图志》增纂；乾隆四十七年五月，英廉等奏称增纂告成，奉旨交武英殿刊刻，并写入《四库全书》。今本正文四十八卷、卷首四卷，共五十二卷，正是这一增纂定本的形态⁶⁷。

²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首《谕旨》，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初九日。

³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首《谕旨》，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

⁴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首《御制皇舆西域图志序》。

⁵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首《谕旨》，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又见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傅恒等《进表》。

⁶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所刊民族文化宫馆藏介绍记：本书乾隆二十一年始纂，二十七年初成，四十二年增纂，四十七年成书，今本四十八卷、首四卷。

⁷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首《谕旨》，乾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六月二十八日；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初十日英廉等《进表》及奉旨。

从史料学角度看，定本中既包含乾隆二十一年前后开始形成的实地调查材料，也吸收二十七年以后新增的州县、城堡、台站、驻防与制度资料。例如卷十对迪化州、昌吉、绥来、阜康等建置的叙述，已经记入乾隆三十八、四十一、四十二、四十四年等后出的设治信息。因而，《西域图志》的“同时代性”必须具体到条目：不能把 1782 年定本中的所有叙述都当作 1756 年前线调查的原貌⁸。

3. 《西域图志》的编纂特点

3.1. 史源多样

《西域图志》的价值恰恰在于史源多样，而不是史源单一。若将全书概括为“全部来自一手调查”，会抹去它最值得研究的编纂结构。就今本可见材料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五类。

史源类型	进入定本的主要形态	可优先说明的问题	使用时的主要限制
御制文书与上谕	谕旨、序、碑文、御制诗文等	编纂意图、官方话语、政治与文化表述	首先是国家意志与修书目的的记录，不等同地方社会事实
实测与调查材料	舆图、晷度、路线、问访、地方分图	空间位置、道里、山川形势及调查方法	测量、缩图、转绘和互勘均可能发生二次加工
官署档案与地方报送	官制、兵防、屯政、贡赋等门类	乾隆时期制度与行政运行的官方记录	记录时间不一，且经过分类、摘要和定名
历代史籍	《汉书》《后汉书》《魏书》《隋书》《唐书》等引文	历史地理沿革、旧名旧说	多为后世文本的再引用，不能当作乾隆时期“实地材料”
编纂者考辨	条目后的“按”语、互证与存疑	清代学者如何解释旧史、定位古地名	属于乾隆时期的学术判断，其结论仍需接受现代考证检验

第一类是御制文书。卷首“天章”、谕旨和御制序保存了乾隆帝对西域战争、舆地知识与修志目的的表达，它们当然具有直接史料价值，但这种价值首先指向“朝廷如何表述西域与修书”，而不是所有被表述对象的客观状态。

第二类是实测和调查材料。何国宗等人的测量、舆图以及后续驻防官员复核，使《图志》具有前代西域志书少见的现场性；但现场信息进入图志后还要经过缩图、分绘、校核和配说，已经不是未经加工的原始记录。

第三类是官署档案和地方报送材料。官制、兵防、屯政、贡赋等门类与乾隆朝新疆军府、州县、屯戍制度的筹划确立过程关系密切，适合研究制度史和行政知识，但应注意“志书条目”与“原始奏折、册报”并非同一种史料^{[9] [10]}。

第四类是历代史籍。《图志》大量征引《汉书》《后汉书》《魏书》《隋书》《唐书》等，用以追索古国和地名。

第五类则是编纂者的“按”语：这类文字往往把古代史籍、当代方位、里程、语音和新图相互参证，是《图志》学术性最集中的部分，同时也是最不能简单当作“古代事实”的部分。

3.2. 史源转化

3.2.1. “图考”证明实测数据并非未经加工的地图史料

《西域图志》卷一《图考》说明，新疆方舆与晷度“得诸目击身亲”之后，编纂时又将大图缩为尺

⁸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十《疆域三·安西北路二》，迪化州、昌吉、绥来、阜康诸条。

幅，并令驻防大吏各就所辖“分绘互勘”，总图不能详尽之处另作分图，地图不能容纳的信息再以文字说明。这段凡例式说明非常重要，因为它揭示了图像史料的形成过程。实地测量并不直接等于今本图版，中间至少还有测量记录、原图、缩图、地方复核、分图与图说等环节⁹。

因此，研究者若用《西域图志》舆图考察乾隆朝地理认知，可以把它视为国家测绘知识进入官修图志后的成熟表达；若要研究何国宗测量的技术精度或某次具体测量路线，则应进一步寻找《内府舆图》、测绘奏折和相关档案，而不能以《图志》缩绘图直接替代原始测量成果。后续学者对乾隆年间新疆测绘的研究以及后续地图史研究，均提示应区分实测地图与志书配图的不同层次¹⁰。

3.2.2. 旧史经由“今地”的重新解释

卷八“疆域一”在“色尔腾海”条下，先后引《汉书》《后汉书》《魏书》《周书》《隋书》《唐书》有关楼兰、鄯善的记载，随后以乾隆时期掌握的方位、道路和水域信息进行判断。编纂者并不是照录某一种旧说，而是把“楼兰最近汉东垂”“西北至车师”等古籍信息与色尔腾海、噶斯淖尔等当时地理认识相互校验，最终形成自己的定位意见¹¹。

这一条目的史料价值至少有两层。若研究汉代楼兰地望，它只是乾隆时期的一种考证意见，证据层级低于汉简、考古材料以及能够直接反映汉代交通的文献；若研究十八世纪中国学者如何借新测地理重释《汉书》，它却是一条非常直接的学术史材料。也就是说，同一段文字对于不同研究问题具有不同的“史料身份”。文学史料学的关键并不是给史料贴上可靠或不可靠的总标签，而是明确它究竟能证明什么。

3.2.3. 从帝王猜想到定本“存疑”

更能说明编纂转化的是“罗克伦”条。乾隆二十一年启动修志时，谕旨曾从语音相近出发，提出“落克兰”可能与“楼兰”相关。然而到今本卷十“罗克伦”条，编纂者虽然仍先说二名“字音相近”，却进一步依据楼兰位于敦煌以西、罗克伦位于天山以北的方位与道里，判断二者“似非楼兰故地”，末了只保留迁徙导致地名转移的可能，并以“未可知耳”收束^{12 13}。

这一细节至少可以纠正两种简单想象。第一，“钦定”并不等于所有皇帝早期判断都在定本中被处理成确定事实；至少在这一条中，定本保留了与早期猜想之间的距离。第二，《图志》的考据并非纯粹的音转附会，它会调用方位、里程和旧史互相约束，并在证据不足时保留疑问。正因为如此，这类“按”语值得被当作乾隆时期历史地理学的史料，而不能只摘出最终结论去证明古代地名。

4. 官修编纂体例

(一) 从初稿到定本

《西域图志》经增纂形成定本。乾隆二十七年初稿与四十七年定本在卷数上有明显变化，今本最终形成卷首四卷、正文四十八卷的五十二卷结构。今本总目所列二十门，并非把搜集来的材料依时间顺序堆放，而是把西域知识重新组织成天章、图考、列表、晷度、疆域、山、水、官制、兵防、屯政……的分类系统。这种体例会改变材料的阅读方式。某地的一条河流被放入“水”，同地军台被放入“兵防”，当地赋役则进入“贡赋”。研究者今天看到的是经过学科化、行政化分类后的信息，而不是地方社会中本

⁹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一《图考一》。原文说明实测之后又有缩图、驻防大吏“分绘互勘”及图说等环节。

¹⁰ 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¹¹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八《疆域一》“色尔腾海”条；所引旧史包括《汉书》《后汉书》《魏书》《周书》《隋书》《唐书》等。

¹²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十《疆域三》“罗克伦”条。该条先据字音提出关联，继以方位道里否定直接对应，并以存疑语气收束。

¹³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首《谕旨》，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

来彼此交织的生活世界[1]¹⁴。

因此，“体例完整”不应仅作为褒义词。对史料学而言，体例是一种选择机制。它决定哪些材料可以获得独立门类，哪些只能附载，哪些被置于卷首形成解释框架。

(二)“天章”的双重性质

卷首四卷“天章”收入平定准噶尔、回部(大小和卓一役)相关碑文、论说、诗歌以及大量御制题咏。它们首先是可以直接进入清代西域文学研究的文本材料，作品的写作时间、题目、典故和空间对象均可与具体历史事件相联系。但“天章”被置于全书最前，也说明这些文学文本同时承担官修图志的解释功能——这正是清代新疆官修方志从“中外一家”转向“守土为本”编修思想的文本表征。研究乾隆西域诗文时，可以据此讨论帝王文学如何参与边疆知识书写；若研究普通地方社会或各族群自身表达，则不能把“天章”的修辞视角直接当作社会全貌[11]-[13]¹⁵。

这一点说明，“文学史料”并不等于“文学作品”。《西域图志》中的诗文属于第一层文学材料，而风俗、音乐、服物、土产、地名等门类则属于文学研究的语境材料。后者可以帮助解释诗文中的物名、乐器、服饰、地理空间和多语地名，却需要先弄清这些条目是调查记录、官署汇报还是编纂考辨，才能决定引用方式。

(三)地名规范与多语转写

《西域图志》对地名极为重视。乾隆帝在有关地名考证的文字中反复说明，西域语言经过汉字转写容易产生误差，因此要求军机诸臣“详考确证，归于一是”。陈世明对书中维汉、蒙汉合璧地名的研究表明，许多地名本身就是多语接触与再音译的产物。这提醒我们：志书所给出的“标准名称”也是乾隆时期国家语言整理的结果[2]¹⁶。

因此，在文学作品中遇到清代西域异名时，《西域图志》十分有用，却不能把它当作跨时代永恒不变的地名词典。它记录的是特定时期经过统一转写、解释和定名后的文本形态；与更早的汉唐译名或地方口语相比，可能存在语音、书写甚至指称范围的变化。文学史料工作应把这些差异保留下来，而不是以今本规范名反向改写其他时代的文本。

5. 版本与载体情况

如果将《西域图志》划成“乾隆四十七年祖本-四库修订本-晚清石印本-现代标准本”的线性谱系，其中若干判断缺乏版本实证。例如，不能在无校勘的情况下断言《四库全书》本“删减少量敏感语句”。

新疆方志文献的版本谱系已有系统的文献学梳理。目前可以较稳妥确认的版本层次至少包括：乾隆二十七年初刻系统；乾隆四十七年增纂后的武英殿刻本；奉旨写入《四库全书》的四库本；光绪年间铅印本；光绪十九年杭州便益书局石印本；以及近现代影印和整理本。国家民委公开的民族文化宫馆藏著录明确列出乾隆二十七年初刻本、乾隆四十七年武英殿刻本、光绪铅印本和光绪十九年石印本等。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四十七年武英殿本著录为“四十八卷，首四卷”[14]¹⁷¹⁸。

现代使用中，钟兴麒、王豪、韩慧《西域图志校注》便于检索、标点和阅读，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整理成果；但当论证涉及题名、异体字、原有行款、图版或版本差异时，仍应回核原刻或可靠影印。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等数据库的OCR文本更应只作为检索工具，其平台已经提示自动识别会引入错字。因此，

¹⁴《钦定皇舆西域图志》总目。今本共二十门：天章、图考、列表、晷度、疆域、山、水、官制、兵防、屯政、贡赋、钱法、学校、封爵、风俗、音乐、服物、土产、藩属、杂录。

¹⁵《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首一至卷首四“天章”。其中收有碑文、论说、纪略及多种御制诗歌。

¹⁶《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首一《西域地名考证叙概》。

¹⁷故宫博物院：《钦定皇舆西域图志》馆藏著录，乾隆四十七年(1782)武英殿刻本，四十八卷、首四卷。

¹⁸民族文化宫图书馆馆藏介绍列有乾隆二十七年初刻本、乾隆四十七年武英殿刻本、光绪铅印本、光绪十九年石印本等。

“电子本－整理本－影印本－古代印本”不能被无差别地统称为“不同版本”¹⁹。

本文自身也受此限制，文中关于今本条目的讨论以乾隆四十七年定本系统和2002年校注本为主要依据，尚未完成二十七年初刻本与四十七年定本的逐叶比勘。故本文可以讨论多阶段成书和史源结构，却不把某一具体字句的形成强行归入“初稿”或“增纂”阶段。

6. 适用研究与使用原则

(一) 作为作品史料

若研究乾隆时期西域文学，《西域图志》卷首“天章”可以直接提供御制诗文、碑铭和论说等作品材料。这类材料的优势是编年与政治事件联系紧密，且被官修定本集中保存；但研究者仍应区分作品原作、编入图志后的编次以及后续版本载体。若作品另见《御制诗集》或单篇碑文，还可利用异本互校，避免把图志中的编次等同作品最初发表形态。

(二) 作为语境史料

《西域图志》的“风俗”“音乐”“服物”“土产”等门类，为解释清代西域诗文中的乐器、服饰、饮食、物产和生活场景提供了稀见的同期参照。此类材料尤其适合做名物训诂和文化语境复原。当一首诗出现某种西域物名或地名时，可以先用《图志》确认乾隆朝官方记录中的名称、形制和区域分布，再结合游记、地方文书、档案或其他民族语言材料判断其社会实际²¹。

但这些条目不能自动代表“民间真实”。官修志书选择何种风俗进入正史、采用何种汉语词汇解释异文化现象，本身就是知识筛选。因而，若研究“官方如何认识某种风俗”，《图志》是直接材料；若研究“当地群体如何理解自身风俗”，则必须寻找主体性更强的材料加以互证。这样的区分比泛泛说“官方史料有意识形态”更具体，也更符合史料批判的要求。

(三) 作为历史地理史料

《西域图志》最具学术史价值之处，不只是它给出了大量古今地名对应，更在于它保存了乾隆时期“古籍－实测－语音－方位－道里”互证的过程。色尔腾海、罗克伦等条目表明，编纂者有时得出较明确判断，有时也会以“疑”“似非”“未可知”结束。这种证据意识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文学史料学与学术史材料。因此，今天引用《图志》进行汉唐西域地名考证时，最稳妥的方式不是写“《西域图志》已经证明某地即某古国”，而是写“乾隆时期《西域图志》据某史籍与当时地理提出某种比定”，再以出土文献、考古材料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检验。把十八世纪的学术判断还原为十八世纪的学术判断，恰恰是尊重史料。

7. 结语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的史料价值，不宜再用“官修、实测、完整，所以可信度极高”这一条单线逻辑概括。它真正值得重视的是一个可追踪的知识生产过程：乾隆二十一年启动实地测绘和地名调查，二十六年材料交方略馆编纂，二十七年形成初稿，四十二年至四十七年再次增纂，最终以卷首四卷、正文四十八卷的形态刊刻并收入《四库全书》。不同阶段产生的调查数据、地方报送、官署档案、旧史引文和编纂按语，被重新分类后共同进入定本。

从三个个案看，《图志》的“史料”并不是未经处理的事实碎片。“图考”显示实测结果还要经过缩绘、分绘、互勘和图说；色尔腾海条显示古籍记载要经过乾隆时期地理知识重新解释；罗克伦条则更清

¹⁹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钦定皇舆西域图志》页面提示，其电子文本由底本影像自动字符识别建立，OCR可能引入错字，引用时应回核图像。

²⁰（清）傅恒等编纂，钟兴麒、王豪、韩慧校注：《西域图志校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

²¹《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三十九《风俗》、卷四十《音乐》、卷四十一至四十二《服物》、卷四十三《土产》。

楚地保存了从语音猜想到方位道里反证、最终保留存疑的过程。由此可知,《图志》的学术价值既存在于结论,也存在于形成结论的方法与犹疑。

对于文学史科学而言,这一区分尤其重要。卷首“天章”可以作为清代西域文学的直接文本,风俗、音乐、服物、土产、地名和輿图则构成文学研究的语境史料;但每类材料的证据性质不同。研究者必须在引用前回答“这条材料是谁记录、何时形成、经过何种编纂、今天要证明什么”。只有把作品、调查材料、官方制度记录、旧史转引和清人考证分别定位,才能真正把《西域图志》从一部“内容丰富的工具书”转化为可被批判性使用的文学史料。

参考文献

- [1] 乔治忠,侯德仁.乾隆朝官修《西域图志》考析[J].清史研究,2005(1):104-113.
- [2] 陈世明.清代《西域图志》维汉蒙汉合璧地名[J].民族语文,2007(1):52-55.
- [3] 薛宗正.读《钦定皇舆西域图志》[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2):74-82.
- [4] 姚三刚,高健.清代回疆地区方志研究[J].新疆地方志,2022(3):32-42.
- [5] 杨磊,葛凡煜.《西域图志》所见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J].新疆社科论坛,2024(2):46-51.
- [6] 吕长颖.《西域图志》编纂与成书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乌鲁木齐:新疆大学,2012.
- [7] 黄祥深.《西域图志》与《新疆图志》比较研究[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2(1):48-52.
- [8] 张瑛.《西域图志》纂修略论[J].西夏研究,2017(1):114-120.
- [9] 锋晖.乾隆朝治理新疆制度的筹划与确立[J].西域研究,2019(2):61-69.
- [10] 王力.清代治理回疆政策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兰州:兰州大学,2010.
- [11] 许建英.清代新疆和卓叛乱研究述评[J].西部蒙古论坛,2020(1):3-10+125.
- [12] 姚三刚.从“中外一家”到“守土为本”:清代新疆官修方志文本编修思想略论[J].新疆地方志,2024(3):43-51.
- [13] 陈守凤.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战始末[J].军事史林,2020,53(8):55-62.
- [14] 高健.新疆方志文献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4.